

# 从文学叙述看抗战时期乡土社会 阶层分化与文化变迁

## ——析抗战题材小说的社会史意义

韩元

**内容提要** 创作于20世纪40、50年代的抗日题材小说，以其宏大的历史叙述、现实主义精神为我们呈现了抗战时期真实的北方乡土社会：作为传统权威的乡绅的没落，底层农民包括妇女阶层的崛起；家族和个体利益让位于民族大义，血缘伦理亲情扩展为同胞之谊；从乐土重迁变为抛家离乡四处杀敌，从麻木认命变为富有革命反抗精神。产生这些分化和变迁的外在诱因是异族入侵、国破家亡的惨痛现实，决定性的因素则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渗透至广大农村每一个角落里的艰苦细致的关于民族国家的宣传教育 and 落到实处、惠及众生的民生政策及社会运动。

**关键词** 抗战题材小说；乡土社会；阶层分化

### 前言

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有关抗战的创伤记忆成为国民的集体无意识，不断反映在此后的文艺作品中，并与时代变迁中的各种民族主义思潮纠结在一起，成为一个敏感话题。今天，荧屏上的“抗日神剧”又成为一个热点现象，因部分作品的严重失实甚至世俗化、庸俗化的取向而广受诟病，由此带来了一个新命题：在民族情绪高涨、文艺创作娱乐化的时代背景下，文艺作品究竟该如何叙述“抗战”历史，才能在呈现审美价值的同时，实现真与善的社会价值？

因为与行之未远的民族创伤、民族记忆相勾连，有关抗战历史的文学叙述注定是不能以娱乐精神和神话风格为起点的，现实主义应该是其最合适的创作精神和创作方法。在新的时代语境下，重读一批创作出版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抗战题材小说，如《腹地》《吕梁英雄传》《敌后武工队》《苦菜花》《平原枪声》等，我们会发现这正是一批有助于反拨当下荧屏将抗战历史虚化、神

化之风的现实主义的力作。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再次出版这批书时也在“出版说明”中强调“这些作品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从创作时间、作家经历及作品生产机制上看，它们都具有现实主义创作的基础。首先，这些作品多构思、初创于抗战后期或抗战胜利后10年左右的时间，放到当时的背景下看，基本属于现实题材作品。《腹地》手稿形成于1942至1943年间，1949年首次正式出版。《吕梁英雄传》开始创作于1945年，初以报刊连载的形式发表，1952年首部完整版正式出版。《敌后武工队》构思于1945年，执笔于1949年，正式出版于1958年。《苦菜花》的雏形《母亲》初稿完成于1955年，之后修改定稿的《苦菜花》首次正式出版于1958年。《平原枪声》初稿完成于1954年前后，1959年正式出版。这些作品的正式出版时间范围在1949至1959年间，所以本文将其归属为“十七年”文学范围。其次，这些小说的作者都参加过抗日战争或自幼耳闻目睹并体验抗战带来的社会变化，其作品自然有生活、接地气。《腹地》作者王林亲历冀中“五一一大扫荡”，冒着生命危险完成了手稿。《吕梁英雄传》的作者之一马烽16岁就参加了抗日游击

队。《敌后武工队》的作者冯志本人就曾是武工队小队长。《苦菜花》的作者冯德英则有着一个热心抗战事业的母亲，自幼接触革命工作，感知抗战时期乡村社会变革。《平原枪声》的作者之一李晓明也是自1938年即参加革命工作。最后，上述作品的素材多来自当时一手的个人经历或二手访谈、时事新闻报道，因而在战争情节、人物形象和社会风貌等方面能做到“细节的真实”，多有纪实风格，而没有后来抗日剧的那种传奇色彩。正如冯志在小说前言中所说：“书中的人物，都是我最熟悉的人物；有的是我的上级，有的是我的战友，有的是我的‘堡垒户’；书中的事件，又多是我亲自参加的。”<sup>①</sup>这些作家也都以“现实主义”作为自己的创作原则，以基于现实中的人与事的感动、激发而非政治先行的目的而有了动笔创作的念头。比如冯志说过“我所以要写敌后武工队这部小说，是因为这部小说里的人物和故事，日日夜夜地冲激着我的心”<sup>②</sup>。在马烽、西戎于1949年为《吕梁英雄传》写的“后记”中，可以看出，小说创作的出发点是为了在《晋绥大众报》上介绍民兵英雄们对敌斗争的事迹，作为新闻报道的初衷也就决定了其写实风格。冯德英在谈到《苦菜花》的社会影响力的原因时说是因为它“真实”，“把抗日战争的复杂性写出来了”<sup>③</sup>，而当时对他影响最大的就是“文艺复兴的那种批判现实主义的文艺传统”<sup>④</sup>，“文艺一定要反映生活，要反映生活的真实性”<sup>⑤</sup>。《腹地》在出版不久就受到了较多的批评，也正是因为如王林在其检讨中所说的接近于自然主义的真实。同样是真实，它与上述其它几部作品不同的是，作者在创作时还没有接触到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只有了社会史某一层面的真实，却没能反映出其他层面的真实，更没能体现出正确的政治思想的指导，所以它一直默默无闻，而上述其他作品则成了“红色经典”。

本文将跳开传统的文学/政治的二维批评框架，在文学、社会、历史、文化、政治的多维视野中，分析上述作品符合恩格斯所定义的“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或者卢卡奇所说的“对一个具体的历史时期作艺术上的忠实描写”的现实主义风格的一个层面：真实再现抗战时期北方乡土社会的变化，包括阶层的分化、文化的

变迁，前者涉及时局动荡中不同身份人的命运浮沉，后者关乎历史的规律与走向。这正是其社会史意义所在。重读这些现实主义作品，有助于我们认识抗战对中国尤其是广大北方农村的真实影响以及抗战胜利的真正原因，这并不是如大众世俗想象中简单的奸杀掳掠，或者依靠如“抗日神剧”中的奇巧功夫、魔幻武器取胜，而是如小说中所表现的那样，这场战争对现代化转型中的农业中国的政治经济及伦理文化观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广大农民在战争的苦难中接受党的宣传教育并受惠于根据地的民生政策，克服了文化因袭的重荷，有了明晰的民族国家意识，形成了坚定的抵抗精神，成为抗战胜利及后来革命最终胜利的坚实基础。而这些，恰恰是当下作为娱乐文本的“抗日神剧”所缺失的。

## 一 乡绅的没落与失语

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是一个基于血缘伦理、由乡村权威控制的自治组织。乡绅在乡土社会中的主要任务有：作为社区的社会领袖和代表；担当地方的警备力量；调解人民日常的纠纷；关心社区的灾荒、赈济、时疫等；为社区的民众树立楷模<sup>⑥</sup>。其合法性权威的奠定主要靠自身的德高望重和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尽责。

抗战爆发前后直至抗战胜利，由于乡土社会的剧烈变动，乡绅阶层进一步分化。“作为个体的人，他的阶级属性也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阶级结构的稳定性不在于个体的固定不变，而恰恰在于个体的流动性，结构震荡剧烈时尤为如此。抗战时期诸多因素促使根据地各社会阶级处于不断流动之中，地主、富农阶级普遍衰落，贫雇农阶级处于上升之中。”<sup>⑦</sup>另一方面，由于抗日根据地民主政策的实施、群众运动的开展及抗战英雄形象的树立宣传，乡绅在乡土社会的精神领袖的权威地位进一步下滑乃至被后者全面取代，逐步退出了乡村公共事务的权力话语系统。

从“十七年”抗战题材小说中，我们能够看出乡绅的这种分化和没落。组织力量抵抗外敌、救济同胞、保护乡土应该是传统乡绅义不容辞的社区公共责任。然而，在小说中，我们看到的乡绅阶层，在面临民族危机时，有的顽固投敌，有

的左右摇摆，有的虽然在受到教育后醒悟，但基本都失去了挺身而出、守望乡土、积极有为的担当和责任，在国难当头、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抗战大潮中，注定要丧失在乡土社会中的主流话语地位。

出现在这些小说中的乡绅由于各自经济状况和社会关系的不同，在对待抗日工作的具体态度上，还是有分化差异的。第一类是大地主兼资本家且同国民党政府有关联的，都是反对并破坏抗日工作的，属于劣绅兼汉奸。第二类是中小地主，或投敌做汉奸，或左右摇摆求周全。第三类是一些财力微薄，在乡土社会中声望的获得主要是靠宗族地位、人品、学识的乡绅，则有可能在现实危机的教育下认同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战工作，并保持民族大义。小说叙述者对前两类乡绅在抗日大潮中的表现都持一种讽刺、谴责和高度怀疑的态度，这种讽刺和怀疑的态度主要表现在小说中的人物在乡村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普遍出现的言行矛盾。社会学研究领域中的乡村或村落公共空间概念源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但又不完全相同，它大致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指社区内的人们可以自由进入并进行各种思想交流的公共场所。例如，在中国乡村聚落中的寺庙、戏台、祠堂、集市，甚至水井附近、小河边、场院、碾盘周围，人们可以自由地聚集，交流彼此的感受，传播各种消息。二是指社区内普遍存在着的一些制度化组织和制度化活动形式。例如，村落内的企业组织、乡村文艺活动、村民集会、红白喜事仪式活动，人们同样可以在其中进行交流、交往”<sup>⑧</sup>。这样的乡村公共空间在抗战时期同样存在，成为战时宣传动员或信息交流的重要舆论场所。

《平原枪声》对全县最大的地主、汉奸苏金荣有这样一段描述：“在全县各界人士抗日动员大会上，县委副书记杜平以‘战委会’副主任的身份，报告了苏金荣捐枪的消息，当场就有不少士绅、地主响应，自动报出捐献枪支的数字。这一来弄得苏金荣哭笑不得，不过他还是冠冕堂皇地讲了一通抗日的主张，可是当他一回到他的公馆，脸色就勃然大变，破口痛骂起来。”<sup>⑨</sup>这里的“抗日动员大会”是战时乡土社会常见的公共空间，与后来的农民诉苦大会一样，是乡土舆论表达的空间。而苏金荣的公馆则是一个私人空间，人物在这两

个地方的表现是迥然不同的。这段话的前半部分接近历史叙述。在村庄遇到灾荒、战乱时捐款、捐粮既体现乡绅的权威，也是职责所在。所以相关史料记载中，常见士绅赈灾或进行“救国捐”的行为。比如《河南全民抗战》一书中记载，1942年河南遇日军侵略又逢大灾时，“各县绅商纷纷捐粮、捐款，救助灾贫。继1942年底临汝县周筱山献粮40石后，许昌周锦堂捐款17万元……全县因捐助灾贫受到政府各种奖励的达12685人”<sup>⑩</sup>。历史叙述中可见的仅是客观的数字及公共空间的语言、行动，而文学叙述则可以深入人物内心和私人空间，可以表达叙述者的主观倾向。所以就有了上述文字中揭露苏金荣心态的“哭笑不得”“冠冕堂皇”等主观色彩鲜明的词语及对其在自家公馆表现的描写。同样，《苦菜花》中的大地主兼特务王柬芝及《敌后武工队》中的“左右摇摆”型土财主周敬之在乡村集会和私人空间的言行都表现出极大的反差，充满矛盾。

小说中反映的前两类地主乡绅在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矛盾，一方面反映了当时抗日根据地的复杂统战局面，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党对地主阶级既争取联合又怀疑斗争的态度。毛泽东同志在1940年发表的《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一文中指出，作为中间势力中的开明绅士虽然可以同我们共同抗日，也可以同我们一道共同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但他们害怕土地革命”<sup>⑪</sup>。而顽固势力中的抗日派也可能会对我们采取两面政策，我们对付他们的两面政策的革命的、非革命的、两面政策，就是“以斗争求团结”<sup>⑫</sup>。小说《苦菜花》中的共产党员姜永泉在王柬芝还没有暴露前一直对他心存怀疑：“是什么力量使王柬芝和这个汉奸家庭的关系割裂得一干二净呢！是真因为他是个知识分子明大理，敌人的惨无人道的兽行激发起他爱国的热情吗？可惜没法了解这个人在外面的经历。是啊，娟子、德松他们说的也有理，他终究是个财主，很难真心跟我们一道走。对，要团结他抗日，也要防备他存心不良。”<sup>⑬</sup>姜永泉的这一心理活动正体现了上述党对地主阶级抗日意图和表现的怀疑和两面策略。

小说叙述者对第三类乡绅的态度表现得比较复杂，既肯定其由传统因袭或自身品行树立的在乡民中的影响力，又批判其反现代性的“依托乡

土”的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既肯定其基于传统“家国思想”的民族气节，又批评其因阶级政治立场缺失而带来的对抗日工作认识上的局限，这种认识上的局限导致他们缺少行动上的执行力或意志的坚定性，所以仍然不能承担传统乡绅组织力量守卫乡土的公共责任，不能成为抗战时期乡土社会的精神领袖。和前两类经常处于矛盾话语中的乡绅不同，这一类乡绅则多数处于被改造、被教育的转变过程中。这一类乡绅还可以细分为以下几类：一、拥有宗法权威的家族族长。比如《苦菜花》中守旧的四大爷，经受了家破人亡的苦难后才开始转变观念，并支持儿子参军抗日。二、参与乡村基层旧政权的士绅。自晚清以来直至20世纪30年代，乡村自治的基层政权中吸纳了一些本地有声望、有文化、有经济基础的人加入，这些人往往是各方政治势力争夺的对象。在“十七年”抗战题材小说中，出现了一些中农以下的村长或村副形象，他们虽然不是抗日的主要力量，起初也有软弱胆小的一面，甚至违心地担任一些伪职，但因有基本的道德感、民族意识和对村民的责任感，所以在经过残酷斗争或共产党的争取教育之后，最后都能站在抗日民族统一阵线中，有的甚至壮烈牺牲。比如《苦菜花》中的村长老德顺。三、来自旧学体系的乡村文人。这类人接受过科举考试的训练，饱读诗书，通晓儒家文化礼仪。因为“与文字、礼仪有关的各种知识在村民的生活实践中扮演着重要角色”<sup>⑨</sup>，所以拥有文化资本、服务社区文化事务的乡村文人在村中有着较高的地位也是情理之中。比如《吕梁英雄传》中的“二先生”老秀才白文魁，显然属于这一类人物，其衣着言行都符合其文化身份和社区文化功能。当日本人入侵康家寨后，他仍能保持士人洁身自好的品质，一定限度内也能起到发动村民的作用。然而他不是康家寨抗日斗争的中坚分子，缺乏决断力和行动力，也是属于被解救的人物。《平原枪声》中的马宝堂也属于这类人物，他中过秀才，然后回乡教书。因为马庄没有财主，所以有文化的马宝堂就成了村里“唯一有地位的人”。抗战爆发后，面对汉奸和鬼子逼问八路军去向时，马宝堂坚守住了士大夫的气节壮烈牺牲。然而这样一个为抗日牺牲的士绅在叙述者笔下仍然是被改造、被转变的失落的形象：他起初思想守旧，

认为共产党不正统，对蒋介石的中央军高度评价，经受了中央军对村民的哄抢和打骂后马宝堂对国民党失望了。当他伤好后，又发现其在关帝庙的话语地位又被新兴的党的抗日力量取代了：“村里组织了农会、儿童团，肖家区还组织了游击队，宣传讲演，减租减息，男女老少，个个忙碌，再不像在关帝庙前听他谈论‘腰别子’那种神情了。”<sup>⑩</sup>这时的他终于明白了：“抗日只有跟着共产党走。”<sup>⑩</sup>

## 二 底层农民的分化

在传统的乡土社会，除了少数的地主乡绅，更多的还是底层普通农民。侵略战争所带来的田园凋敝、家破人亡，后者受害尤甚，而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发动和依靠的主要对象也是这一占农村绝大多数的阶层，经济、人伦和政治的动荡变化使这一阶层的分化流动，表现出比前者更复杂的局面。

在“十七年”抗战题材小说中，我们看到着墨最多的主要正面人物都是贫农阶层构成的。抗战爆发后，出身贫寒的他们身怀家恨国仇，在党的宣传发动和领导教育下，思想上不断成熟和进步，意志始终坚定地投身抗战的第一线，并成为农村新政权的主要力量和乡土社会的新精英，代表乡村话语主流。具体而言，他们的成长上升之路又有几种不同的轨迹，一类是加入共产党并成为职业军人，比如《苦菜花》中的姜永泉、《敌后武工队》中的魏强等。这一类人物是这一阶层的真正领导者，也是小说的主人公。第二类是加入抗日民主政府领导下的村政权及各类非正式武装力量和群众组织。比如抗战之前的山西，村长基本是由富人地主充任，而抗日根据地则对此进行了改变，武乡县“不少世代受剥削、受压迫的长工、羊工、矿工（其中多数是共产党员）被选为村长”<sup>⑩</sup>。《平原枪声》中英勇顽强的游击队员老孟就是一个籍由抗战实现在乡村社会中的地位从“无名无语”到主流转换的典型形象。抗战前，在村人的眼中，50多岁的他无名无地位无历史，“他叫什么名字谁也说不上来，人们只知道他叫老孟，是跟人家赶马车的。在人们的印象里，仿佛他一生下来就叫老孟，一生下来就给人家赶马车似

的”<sup>⑧</sup>。被地主苏金荣迫害，他也是麻木承受忍让无声音。然而，共产党员马英的到来及其抗日救国的道理，却使得老孟突然发声，“于是他第一次用他那激动的声音对马英说：‘打日本我老汉也算一分，豁出我这百十来斤都搁上它!’”<sup>⑨</sup>后来老孟加入了共产党，成为新成立的区委委员之一，并在历次对敌战争中表现英勇，成为村民心目中保卫乡土的英雄人物。

除了上述这类人物以外，抗战时期的中国农村还有一类贫民形象，虽然也属于乡村底层，但因为其一无所有的经济状况、恃强斗狠的精神气质而被学界归为“游民”或“无赖型能人”。“这一阶层群体的成员许多人崇尚武力，以力量强人的形象活跃在村落地区。”<sup>⑩</sup>“如果恰逢动荡与混乱的年月，对于游荡在社会上且以不务正业为存在和谋生方式的乡间无赖来讲，实为谋利的极佳时机，由此，他们本身特有的不安分基因更会被大大激活，爆发出无穷的战斗力。”<sup>⑪</sup>抗战时期，也是这一阶层分化和流动性非常强的一个时期。他们有的成为土匪，有的则加入地方各种会道门组织，还有的是以独立的姿态坚决抗日。

在“十七年”抗战题材小说中，有一些次要人物形象可归为上述“游民”一类，比如《吕梁英雄传》中的乡村无赖王臭子及地痞邱得世等，还有《苦菜花》中的土匪柳八爷，虽有抗日热情，但是却带有游民的致命弱点：散漫、缺少纪律性，后来在党和群众的教育下，终能克服这一弱点而加入八路军接受党的领导，投入抗日前线。小说对土匪抗日的肯定一方面是基于当时的史实：抗战时期乡村土匪横行，一部分是为了趁乱发财，一部分则是豪强之士聚众保卫乡土。另一方面，是因为土匪多出身贫穷的游民，具有该阶级所有的反抗性，而叙述者对这种反抗性是高度赞扬的。小说《平原枪声》则侧面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华北农村比较复杂的会道门组织现象。魏宏远、左志远主编的《华北抗日根据地史》中记载，20世纪30年代华北农村出现了很多会道门组织，如大刀会、红枪会、黑枪会，这些组织起初是农民对付土匪的自保组织，后来则被地方豪强、流氓所控制<sup>⑫</sup>。后者实际就是地主劣绅和无赖游民。如《平原枪声》中红枪会的头子就是前面所述的劣绅苏金荣，白吉会的头子则是流氓王金兰。小说开

篇第一章“肖家镇上”反映的就是两个帮会组织——红枪会和白吉会——之间紧张激烈的复仇械斗，后在回乡的共产党员马英一番教育和引导下，红枪会底层成员王二虎才意识到都是中国人，要多留一条命打鬼子，停止了帮会复仇行为，后来在共产党员的引导带领下他手刃了投敌的白吉会首领王金兰，走上了脱离会道门组织坚决抗日的道路。《平原枪声》中的帮会分化斗争实际反映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华北各地的会道门组织的复杂的分化局面。据史料记载，这些民间帮会组织有些被日伪控制，有些则能基于传统的民族大义和保卫乡土和同胞的感情坚决抗日，从而联合在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上述小说中被收编改造的土匪和走上抗日道路的会道门成员形象也反映了当时党争取地方武装力量的工作所取得的成就。

值得提及的是，抗日战争的爆发也为中国农村的底层女性提供了上升的渠道，主要表现为通过参加抗日工作介入社会事务，接受教育，自由选择伴侣。而抗战爆发前的农村女性地位是居于乡土社会最底层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的中国农村，女性的地位很低。这在社会经济落后的太行地区表现更为明显。在家庭里，女性被打骂虐待，没有婚姻自主权。经济方面，没有财产继承权，不能掌握家庭经济。政治方面，不受法律的保护，不能参加政治活动。另外，女性不能参与社会问题，不能接受教育。”<sup>⑬</sup>抗战作为一场全民的战争，不仅要争取一切可能团结的阶层，女性的作用和力量更不容小觑。传颂至今、不断翻新的“花木兰”的故事就是我们民族文化传统中对女性在战争中能力和作用的一种肯定。抗战时期，中共非常重视农村的妇女工作，根据地普遍成立了妇女救国会，鼓励妇女走出家庭、挣脱束缚，接受教育，参与经济生产、社会事务甚至武装力量。从相关史料中可以看出妇女为抗日工作做出的巨大贡献：“1943年太行第七专署，有30000名妇女纺织，生产土布500万疋，得工资粮200余万斤。这不仅对战胜灾荒起了重要作用，还促进了消费、生产合作带来的发展。”<sup>⑭</sup>1940年7月制定的《太行军区的组织及其工作纲要》规定，20岁至40岁之妇女，均应参加自卫队。这些女性在自卫队中的作用和男性一样，负责铲除汉奸、肃清敌探、

破路拆堡、空舍清野、救护伤病员等<sup>⑤</sup>。在红色抗日经典小说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底层农村女性在抗战中的成长和上升。她们有的成为党的基层领导，如《敌后武工队》中的汪霞、《苦菜花》中的娟子，从传统的附属于男性的地位上升为农村新精英阶层的一员。更多的则如《平原枪声》中的云秀、《敌后武工队》中的河套大娘、《苦菜花》中的母亲、兰子，是当时千千万万承担着抗日生产、后勤工作的农村女性的真实写照。

### 三 乡土社会文化变迁

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外来危机促进了民族主义思潮的发展及民族国家观念的初步形成，“历史上中国从来不曾有过‘民族国家’的观念。在中国文化中，‘中国’就是天下，是世界的中心……19世纪鸦片战争的炮火迫使中国进入了基本上由民族国家组成的充满竞争的国际社会。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和瓜分，存亡危急，现代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引进，社会政治运动，民族革命，等等，锻造了中国民族主义的自我意识，中国人才被迫以陌生的国家观念取代了传统的天下观念，使中国人凝结为一个民族的整体”<sup>⑥</sup>。在上层知识分子精英阶层，民族主义是一整套系统的理论建树，在下层百姓那里，则是一种朴素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绪。

乡土社会中民众的民族国家意识在和平时期可能是潜隐的、松散的、片断的甚至是无意识的，在异族入侵、家破人亡，原有农业社会的平衡稳定的生活被打破之后，遇到强有力的领导，则可能被激发、被凝聚，转变成抵抗力和革命精神。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中共利用民族国家的口号，对广大农村各阶层尤其是农民进行了艰苦的发动和动员工作，使原本松散的，以家庭、家族为本位的乡土社会的民众转而以国家民族为重，从血缘伦理亲情上升为民族大义、同胞之谊，从安土重迁转向离乡从军、奋勇杀寇，可以说，抗战时期是我们民族精神、爱国主义表现最集中最动人的时期，也是乡土社会家国观念、政治思想发生较大变化的时期。

传统的乡土社会是以血缘伦理为纽带，以家族为基本单位，有固定的人际关系和稳定的村落

空间。抗战爆发前，中国大部分的村落都是这样的一种超稳定的结构，正如石岛纪之的书中指出的：“太行山区的许多村落的历史达千年以上……大体来讲，家族的观念很浓厚，血缘关系、宗族关系、辈分关系像网络一样盘根于这个社会。”<sup>⑦</sup>在这样封闭落后的宗法社会中，可想而知，近代以来民族主义及国民革命的影响都是非常微弱的，“1936年，北京周边地区农村还可见‘仍有农民认为现在还是大清朝’状况的存在”<sup>⑧</sup>。

然而，日军的入侵和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改变了这一切。首先，乡土社会所附着于上的土地被占领，而土地不仅是家和村落形成依附的基础，是乡村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的关键要素，更是家国情结和民族意识附着其上的地理空间，“民族主义感情屡屡通过对过去的崇拜而表现出来，而这个过去，自然要体现在一块领土上。对于民族主义来说，领土就是承载民族过去的载体”<sup>⑨</sup>。“世界上一切社会和文化都感到，扎根在属于自己的一块土地上才有安全感和认同保证。一切人类共同体都需要一块可以保证他们生活并通过它能表明自己存在的地理区域。”<sup>⑩</sup>所以，我们在“十七年”抗战题材小说中，经常可以看到叙述者用大量的篇幅对当地风貌物产进行描写，表达出一种深厚的故土家园依恋情结和对家园被破坏的愤怒之情。比如《苦菜花》开头对昆崙山一带田园风情的描写，《吕梁英雄传》对吕梁山“土地肥美，出产丰富”的赞美，《敌后武工队》对“五一”扫荡前后冀中平原乡土风情的对比。

其次，日军的残杀暴虐导致了乡土社会众多的家破人亡，破坏了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和传统道德。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以其抗战时在中国的亲闻亲见亲历告诉我们，八路军在北方的一个偏远的小村子里进行抗日宣传时，对当地农民触动最大的就是“日本侵略者蓄意犯下的、从根本上触犯了中国的家庭道德观念的暴行”<sup>⑪</sup>。在“十七年”抗战题材小说中，有关日军残杀强奸、破坏家庭伦理的描写比比皆是，比如《敌后武工队》中韦长庚苦苦盼来的传宗接代的唯一的孙子就死于日军及汉奸之手。小说中贫苦农民的妻女是被侵略者强暴，而无耻的汉奸则是主动将妻子送给日军长官玩弄。几乎所有的正面人物都因为日军的入侵而家庭残破。

最后，日军的侵略破坏了农业生产，导致了田园凋敝、民不聊生。广大的土地成为战场后，“许多农民或丧命或被征召参战，农业生产受到破坏，很多难民由此而涌现。另外，大量的粮食被征集为军粮。并且，自然灾害比平时造成的损害更大”<sup>②</sup>。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日军对农村经济的破坏，对农民的掠夺，以及后者在共产党八路军的领导下保卫自己田园收成反掠夺的斗争。比如《平原枪声》中鬼子为了阻止八路军的活动而令伪军将全县高过四尺的庄稼一律砍倒，震动激怒了全县数十万农民，而共产党则组织全县力量开展了“保卫青纱帐”运动。

在石岛纪之看来，长期战争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破坏，然而也有“建设”和“变革”的一面，这就是“通过抵抗日本的侵略，也促进了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思想水平，尤其是它在农村地区的渗透及中国国家、民族的统一”<sup>③</sup>。詹姆斯·贝特兰的书中也提到，中国人民正是从北方的山区里最早发起了抵抗侵略的战争，华北人民过去对谁来统治表面上保持着“麻木不仁”的态度，然而日本人的侵略和占领改变了这一切，“日本人残忍野蛮的行径，恰恰帮了八路军和八路军的政工人员的忙”<sup>④</sup>。在“十七年”抗战题材小说中，我们看到党在农村的抗日动员和宣传是深入细致到每一个村落和家庭的，在战争的严酷环境下，在传统宗法社会里，这是一项艰苦卓绝的工作。

抗日工作需要以国家民族为重，尽管中国士人有家国同构的思想，但对于习惯以家、族为本位的传统农民来说，为了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的利益而牺牲家庭和个人利益还是一个相当的挑战。《吕梁英雄传》中康家寨中的部分村民因为亲人被鬼子抓走，而被迫同意敌人的维持计划，就是基于血缘亲情的本能反应。“在一般中国人眼里，家庭纽带是至高无上的。为了反对这种观念，必须树立起国家观念，必须用新的意识同世代奉若神明的观念和意识进行斗争……最先建立起一种高于家庭的观念的中国人，也许要算共产党人。”<sup>⑤</sup>在“十七年”抗战题材小说中，我们看到，党的宣传正是在毁于战争或阶级压迫的破碎的家的基础上，重新树立起一个完整的国家民族观念。这一观念实际还是中华文化中传统的家国一体思想的范畴，由血缘亲情辐射到国族同胞，

由个体利益到集体利益。

在这些小说中，普遍表现了发生在主人公身上的家国矛盾、艰难选择及最后的毁家纾难、取义成仁。《苦菜花》中的母亲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将对子女的爱扩展到了并无血缘关系的同志，“她爱每一个战士，爱整个八路军”<sup>⑥</sup>。母亲为了这种大爱将子女送入革命队伍，牺牲了长子，并为掩护军工厂又忍痛牺牲了幼女。宗法社会的母慈子孝让位于民族大义了。《苦菜花》中的农妇花子、党员娟子在敌人让村民认领自己亲人以识别八路军的时候，都没有认领自己的丈夫，而是认领了八路军战士。夫为妻纲的伦理关系也升华为革命大爱，正如小说中描写：“姜永泉只好接受她那不是妻子的，可比妻子伟大高尚的亲吻！一个老革命战士老共产党员，深切地感到，是人民，是母亲，在保护着他！”<sup>⑦</sup>

除了民族阶级理论的宣传，要广泛地调动起务实甚至有小农意识的农民抗战热情，关键还在于根据地开展的一系列群众运动和民生政策。“在农民的传统心态中，有‘人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命运思想，浓厚的因果报应思想。他们认为地主的土地是从祖先手中接过来的，对地主的土地下手是丧‘良心’。另外，还有寻求安定生活的‘太平观念’、等待世道变化的‘变天’思想，都在农民心里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农民的这些传统心态，成为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和文化改革的一大障碍。”<sup>⑧</sup>1939年到1942年，在各级党组织的细致调研和组织宣传的基础上，华北各根据地兴起了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召开群众大会，斗争恶霸地主，“让他们认识到是他们养活地主，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sup>⑨</sup>。为了克服一般农村青年安土重迁、“好男不当兵”的传统观念，“根据地实施抗日宣传、慰劳战士、优待抗属等政策。比如没收汉奸的土地财产分配给抗属，组织代耕队帮助耕种收获，减免抗属应承担的赋税，在各种庆祝会、纪念会上对抗属进行表彰，组织妇女制作慰劳品赠送士兵等”<sup>⑩</sup>。通过上述一系列政策实施和群众运动的开展，不仅使农村的阶级关系发生变化，而且极大地提升了农民入党、参军的积极性，壮大、稳定了抗日的队伍。

“十七年”抗战题材小说用了相当多的篇幅形象且真实地反映了党在根据地实施的各项民生政

策、开展的各项群众运动，有力地解释了党在广大农村赢得民心取得抗战胜利及最终赢得政权的原因。《吕梁英雄传》开篇就介绍“新政权为了团结各阶层共同抗日，实行了减租减息政策，使家家有活路，人人有饭吃，好发挥出一切力量齐心抗日，保卫家乡”<sup>⑩</sup>。书中还介绍为了稳定民兵的军心，春耕时民兵的地由变工队帮忙种；抗属康大婶平时经常得到抗日政府和村里群众的帮助、慰问，“变工队给代耕地，政府拨给优待粮。每逢过年过节，不是请吃饭，就是送慰问品”<sup>⑪</sup>。所以康大婶不断念叨：“抗属真光荣呀！给你叔捎上道信，把这事都告诉他。叫他安心打日本！”<sup>⑫</sup>《苦菜花》中记叙“抗日民主政府实行了减租减息、增加工资、合理负担的政策。并没收汉奸卖国贼的财产土地，分给那些最贫苦的人们。当他们那长满茧的手，颤抖地拿着新发的盖有民主政府的大红印的土地照时，两眼流出感激的眼泪，心是怎样地在跳啊！世道变了，是的，社会变了。但最使他们感动的是，能好坏使肚子饱一些，能说一句从祖辈不敢也不能说的话：‘啊！这块土地，是我们的！’”<sup>⑬</sup>这段文字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农民在抗日政府新的土地政策实施后心态的变化。

基于国家民族思想的树立和保卫已有胜利成果的务实心态，广大农民克服了乐土重迁、“好男不当兵”的传统思想，踊跃加入到反侵略的民族战争中，“抵抗外来侵略时，游击队理论采用全民皆兵、全面动员本土力量的战略，这必然全面‘解构’传统的乡土结构”<sup>⑭</sup>。几乎每部小说都有一个村民踊跃参加抗日武装的高潮场面。《苦菜花》中鬼子扫荡之后，在共产党员姜永泉的发动下，要参军的青年在“台子上排了长长溜”。《敌后武工队》结尾时县委领导号召大家参军以取得最后的胜利，立即就有几百个青年报了名。这样的场面也是史料中记载的1945年根据地出现的空前的参军运动浪潮的反映。

王林的小说《腹地》之所以在当年受到批判，主要在于用过多的篇幅、众多的人物形象来真实再现了抗战时华北地区部分传统农民的务实和落后思想：贫农辛宝发利用游击队的账目不清贪污发家后胸无大志只关注个人娶妻生子发家致富；贫农老明叔一直认为革命的目的就是发财、改善生活；最致命的是，主人公的父亲和弟弟也毫无

民族意识和革命热情，前者在儿子归家后让其做个小买卖赚钱，见儿子带着抗日战士来家吃饭，脸色阴沉；后者也因大哥受打击而变得非常务实，一心放在扩大土地亩数、当官娶妻、逃脱从军上。这和其他红色小说“父子英雄、满门忠烈”的主旋律迥然不同。其实小说所表现的抗战时华北农村底层农民的复杂思想状态从一个角度也反映了党在农村发动和教育农民工作的艰巨性，正如刘小枫所说“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个朝代对中国社会基层结构的触动有我们这个世纪这么大——没有哪个朝代能像现代的游击队（尤其武工队）那样，把支部建立到村庄中去”<sup>⑮</sup>。没有这些基层宣传教育和切实的民生运动，根本无法把落后的农业社会的农民凝聚到本质上是反传统的现代化民族战争中去。而《腹地》对于后一方面的反映确实是薄弱了许多，所以最后生活优越、家庭幸福的辛宝发等人面对敌人的威逼毫不屈服、壮烈牺牲的结果让人非常意外，作者也没有解释其原因。相比之下，《吕梁英雄传》也写了农民的落后及民族意识的缺乏，甚至主人公贤惠的妻子也不是所谓的革命英雄，岳父还是汉奸，但因为对根据地党的领导和各方面的民主民生政策介绍得比较全面，主人公意志坚定而没有辛大刚式的内心矛盾痛苦，小说格调明朗，情节紧凑，更多借鉴传统小说的叙事手法，故而能被当时主流话语和大众接受，流传甚广。

抗战时期女性走出家庭参与社会事务，实现了在乡土社会中地位的上升，由此导致了农村中新型男女关系的出现，即婚姻伴侣不再是封建家长包办，而是一种迥异于从前的、基于志同道合的自由选择，包括自由结婚和自由离婚。《苦菜花》和《敌后武工队》都用了大量的篇幅来描写革命男女的这种新型恋爱关系，《吕梁英雄传》虽然是一部男性英雄小说，但是其中仍有一章为“自选对象树立新风尚，新式结婚打破旧传统”，反映了农村男女新型的择偶取向：不是基于郎才女貌或财富多少，而是基于在生产劳动和抗日工作中产生的钦佩和爱慕。《苦菜花》作为一部女性视角的小说，更深刻全面地揭示了抗战时农村男女关系的变化及由这变化而来的阵痛。其中杏莉娘是一个勇于追求爱情的女性，她顶着世俗和宗法的压力与长工王长锁“私通”，抗日政府支持了



她对爱情的追求。另一对男女救会长花子和长工老起的爱情则更曲折复杂，遇到的阻力更大。花子婚姻不幸，先是和老起“私通”并有了身孕，然后又要和丈夫离婚。未婚先孕及离婚在传统乡土里是惊世骇俗的，不要说宗法家长四大爷震怒，村里的老人们也以此为由反对女性出来工作，即使村里的干部们也认为影响很坏，要让他们游街，是开明的“母亲”上区里去取得了支持，在党的关心下，花子和买卖的婚姻一刀两断，和老起正式结婚。

以现实主义精神叙述抗战历史和社会变迁，创作于建国初期的这批抗战题材小说不仅有其社会史的意义，而且可以为当下抗战剧的创作如何尊重历史、尊重民族情感、尊重受众认知能力提供一种指导思路。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当代文学影视改编的民族性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5BZW170)的阶段性成果]

- ①②冯志：《写在前面》，《敌后武工队》，第2页，第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 ③④⑤俞春玲：《〈苦菜花〉及其他——冯德英访谈实录》，《新文学史料》2015年第4期。
- ⑥参见周荣德：《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一个社区中士绅身份的研究》，第94页，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
- ⑦王先明：《变动时代的乡绅——乡绅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1901—1945）》，第426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 ⑧曹海林：《乡村社会变迁中的村落公共空间——以苏北窑村为例考察村庄秩序重构的一项经验研究》，《中国农村观察》2005年第6期。
- 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李晓明、韩安庆：《平原枪声》，第41页，第73页，第73页，第25—26页，第27页，人民文学出版

社1959年版。

- 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陈传海、石小生、郭晓平：《河南全民抗战》，第189页，第218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7页，第74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 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冯德英：《苦菜花》，第108页，第128页，第415页，第121—12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2005年第一次印刷。
-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渠桂萍：《华北乡村民众视野中的社会分层及其变动（1901—1949）》，第73页，第156页，161—162页，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日]石岛纪之：《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民众：饥饿、社会改革和民族主义》，李秉奎等译，第78页，第57页，第89页，第56页，第186页，第3页，第201页，第56—57页，第157页，第8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参见魏宏运、左志远主编：《华北抗日根据地史》，第7页，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
-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徐迅：《民族主义》，第22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西]胡安·诺格：《民族主义与领土》，徐鹤林、朱伦译，第55页，第12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 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英]詹姆斯·贝特兰：《不可征服的人们——一个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抗战》，李述一等译，韩红等校，第285页，第284页，第297页，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
- 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马烽、西戎：《吕梁英雄传》，第2页，第275页，第27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 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刘小枫：《儒教与民族国家》，第220—221页，第221页，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责任编辑：萨支山